

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现实定向 ——由《新大众哲学》而来的启示

吴 晓 明

《新大众哲学》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因为这部著作可以说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遥相呼应。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阐释、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持续着。时隔大约 80 年，时代条件已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时刻。因此，《新大众哲学》理所当然地包含着许多新鲜而独特的思想内容。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依然高度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基本宗旨。这一宗旨贯彻突出地构成了《新大众哲学》的鲜明特点：它要求在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能够密切关注中国道路和中国问题，能够积极反映时代的挑战与课题，能够高度契合大众的经验与关切。这样的特点无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是大有裨益的，但其意义不止于此。我想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作为思想的任务并不仅限于宣传或普及工作，它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理论界和学术界都有深入和持久的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最关本质的现实定向，而这种现实定向对于我们来说不能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可以说是《新大众哲学》给予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研究方面迅速复苏，取得了快速的进展。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尤为突出，在经典著作和思想史、基本问题与理论观点、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进展与学术成果。较之于以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学术化：整个研究不再仅仅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而是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其学术—理论的方面，并依较为严整的学术的方式和规范使之得到阐述与发挥。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重要进展，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复兴。在这一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内容、学术品质和学术要求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

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这一学术化复兴的进程本身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之所以应当对此加以肯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确实包含着至关重要的学术内容与学术向度。对于其学术方面的任何一种怠忽或拒绝，都将极大地损害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积极参加革命实践的同时，还经常“退回书房”；我们还知道，马克思曾长期在大英博物馆等地从事他的理论研究，而这

样的研究甚至是以最严苛的学术方式和学术标准来开展的。列宁曾说过，如果不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个简要的说法突出地指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所固有的学术向度。要言之，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作为“科学理论”而成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的，因而这样的思想武器决不是“不学无术”的，相反，它是以“科学理论”所必备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要求锻造出来的。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学术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理解仍可能是片面的、空疏的和肤浅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克思经由其哲学变革而达致的根本立场表明：学术——任何一种学术——都不是、也不可能本身自足的或纯粹“自为”的，而只是特定社会现实的思想表现或理论表现。虽说这样的思想表现或理论表现往往在形式上具有独立性的外观，但就其实质而言，它们作为学术都是以特定的社会现实为前提、为内容、为本质根据的，并且是以此一现实的历史性变迁为转移的。在这个意义上，以为学术本身是纯粹自足和独立的观点，以及无限制的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都不过是一般意识形态的幻觉罢了。由此我们便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现实定向，亦即将其学术的本质性导回到社会现实中去。如果说任何一种学术归根到底都可能摆脱特定的社会现实，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学术研究来说，其根本特征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由社会现实来定向的本质性，并且将揭示、切中和深入现实作为自身最本己的任务。

因此，在这里重要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包含学术的品质，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具有本质重要的、不可须臾相失的现实定向。这一定向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学术必将在实践中参与并深入到社会现实的运动之中，就像它在理论上把这一现实运动理解为自己的本质来历一样。但是，自从我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取得积极推进以来，一部分研究者却逐渐遗忘了这一学术之最关根本的现实定向。他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以象牙塔中的“纯学术”自诩，并且把远离“不洁的”现实作为其学术之高贵性的标记。对于这种倾向我们要说的是：如此这般的作用也许可以走向某种经院式的学术，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因为它还完全执迷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即纯粹的学术只是胎息于“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之中。

对于这种倾向的不满便也导致了相反的立场：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立脚点是社会现实，因而它就是非学术甚或反学术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学术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这一立场虽说与上述倾向截然对立，但两者却分享同样的前提，即学术与现实的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非学术的观点实在是太过看轻了“现实”，似乎现实是可以通过知觉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因此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论或学术，甚至把拒斥理论或学术看成是切近于现实的真正标志。须知“现实”决不是如此这般轻易的东西。黑格尔指出，现实不仅是“实存”，而且是“本质”（因此“现实”概念出现在《逻辑学》的“本质论”中，而不是出现在“存在论”中）；进而言之，现实性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既然“现实”本身包含着本质的和必然的东西，那就唯有通过特定的学术—理论才可能来加以揭示和把握。那种以为仅凭知觉就能抓住现实的观点，实际上恐怕连现实的皮毛都未曾碰到呢。不仅如此，不同的学术—理论对于现实的自觉程度和深入程度也是不同的。海德格尔曾就此谈论过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独特优势，他说，现今的哲学只是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它们不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

二

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现实定向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必须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广大领域之

中。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基础定向立即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学术研究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大体包括两个方面。如果我们以“中国化”为主来对此加以阐述的话，那么这种中国化所蕴含的两个方面是：第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学术真正成为中国的？第二，如何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以切中和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为鹄的？很显然，这两个方面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体系要能够真正在中国立足并具有根本上的实际效准，它就必须首先应和着特定社会与时代巨大需求而成为“中国的”。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历史上曾经见到过，那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之真正成为中国的亦即其中国化，最最简要地说来，需得经历两个进程并相应地具有两个代表性的人物。第一个进程是佛教的引进、翻译、研究和传播，其杰出的代表就是唐僧玄奘（当然只是作为标志来使用）。玄奘精通梵文以及与佛学相关的其他重要语言，长期留学印度，成为当时最顶尖的经师，随后带着许多佛典归国，大开译场，于佛学的翻译、诠释和研究方面居功至伟。但是，我们知道，玄奘的佛学乃法相唯识宗，虽说高严精深，却影响甚微且为时短暂。于是就需要有第二个进程，也就是使佛教大规模地中国化。在这方面最为成功的是禅宗，其突出的代表即六祖惠能（同样也只是作为标志来使用）。惠能的重大贡献不仅是使佛教教义大大地简化了，而且尤其是使之契合于民族精神的基本仪轨并从而在其传统中深深地扎根。就此而言，这第二个进程较之于第一个进程来说也许更为关键，因为正是这一进程方才使得外来的佛教决定性地成为中国的。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说得非常正确：“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

佛教的中国化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如此。20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学说正是应当时中国之最重大的社会和时代需求而进入到中国的。此种进入，当然同样需要一个引进、介绍、翻译、研究和传播的进程。在这方面，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党内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欧洲、日本、苏联者）曾作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若仅就这一点而言，“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是值得赞许的，而且作为一种形式方面的学术品性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要能够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并成为名副其实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也必须经历第二个进程，即大规模地中国化。如果缺失这种依循特定的社会现实来定向的中国化，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方面具有积极的效准，并且尤其不可能在我们精神文化的构建方面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曾经给予我们较为遥远的历史性启示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则给予我们更加切近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这是具有现实定向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只要我们遗忘或试图消除这一现实定向，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立即变成一种仅仅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外部反思简单说来也就是教条主义：它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中去，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说，有一个阶段，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曾把中国革命的道路设定为这样一个原则，即“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这个一般原则固然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来，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来；但由于它仅仅采取外部反思的方式，而从来没有使之深入到并契合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以其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唯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进程是与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本质相关的，通过把握这一现实而得到理解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呈现出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也才开始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唯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之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定向乃是其最本已的生命线；而外部反思则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取消了这一现实定向。

也许有一种意见会主张：我们是做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于这样的纯学术来讲，它的实践运用或中国化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和理应被去除的。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确实包含着十分重要的学术向度，但这一学术恰恰是以深入地把握和切中社会现实为根本宗旨的。废除这一宗旨，就不再有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或者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就会转变为它自身的对立物。对于一般地以为“纯学术”能够避开意识形态并因此而自鸣得意的观点来说，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这种观点不仅是天真的和幼稚的，而且恰恰从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的意识形态幻想。任何一个熟悉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人都知道，一切意识形态（即虚假观念）都是以对自身的现实前提和现实基础的无知为依据的；唯当这种现实的前提或基础得到批判的揭示和把握，人们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才开始失去它们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

三

既然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最关本质的现实定向，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就必须依循此定向而全面地中国化。这种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已如前述，亦即使此种学术研究“成为中国的”。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短语来表示这层意思，那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真正成为“讲中国语的”。很显然，这里所谓“讲中国语”的意思决不仅仅意味着单纯的翻译、用中国语来复述经典或讲解原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指真正被我们掌握的、在传统中生了根的，因而在我们的经验构成中实际起作用的东西。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曾特别谈到过“让哲学讲德语”的事件。就此而言，沃尔夫固然功不可没，因为他第一个开始用德语来写作哲学著述；但真正让哲学讲德语的，则应该是康德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因为这一哲学构成了真正属于德意志民族自身之精神的核心道说。

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之中国化的第二个方面，即“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依此定向去真正把握中国道路、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这样的研究，至少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还是相当薄弱的，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这里存在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之最主要、最基本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该对象从一个方面来说固然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经典、学说和文献，对此加以研究可以被称之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我们近年来确实取得了不少进展和成绩，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局限于这种“纸上得来的”学问。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具有最坚决的现实定向，那么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对象就决不会仅仅局限于这样一个地带，相反，它必须扩展和推进到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真正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领域，即社会现实的领域。就此而言，不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必须不断地追溯到这个领域，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必须以直而且深入于这个领域为最根本的任务，并使这一任务在全部学术研究中贯彻始终且持之不墮。更加直白地说来，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从总体上来说不以切中社会现实为最终依归，如果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就总体而言不从社会现实的深处去提出和应答中国问题，那么，在这里就谈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

因此，我们极力倡言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进入到一个以社会现实为定向的更加深广的世界中，倡言“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际去揭示和探讨其独特的问题、经验和道路。这个更为深广的世界虽说至今人迹罕至，却正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本质领域和用武之地。那些鄙薄“现实”并自恃学术清高的观点把事情完全弄颠倒了：当黑格尔史无前例地重

新拟定了“现实”概念的哲学内涵（其要义在于实存中的本质性或展开中的必然性）之后，能否深入地揭示、把握和切中现实甚至应当成为衡准学术竞争力的当代标尺，成为考量学术深度的真正试金石。海德格尔称马克思的历史学之所以比其他的历史学来得优越，是因为它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即现实）中去了。而雷蒙·阿隆之所以批评萨特和阿尔图塞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是因为他们的研究仅提出了诸如“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可能”这类非常抽象的问题——或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康德式的问题，而未曾真正用《资本论》的方法去研究法国或欧洲的现实。总而言之，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如果不深入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如果不将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从根本上纳入自己的视野，那么它就会在总体上丧失其源头活水，并因而不再有真正的作为和远大的前程。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讲某种学术研究的中国化是否太狭隘了，难道不需要“世界视野”么？确实，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必须具有最广阔的世界视野，因为先前诸民族的或各地域的历史在现代已经变成了“世界历史”。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其世界视野同样完全是以现实来定向的。换言之，它不是从抽象观念的太空来俯瞰地球的世界视野，也不是从“无人身的理性”这个圣域来遥望俗界的世界视野。恰好相反，只是在比如说“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当然也可以是其他特定的社会现实）中，才包含着真正被具体化的和以现实来定向的世界视野。因为这样的现实本身是为世界历史所规定的，如果去除这些规定，也就根本无所谓现实。这意味着：在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一任务中，必定已经本质地包含着得到合理理解的世界视野——站在现实大地之上的世界视野。约言之，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之能够积极地呈现，必已先行要求这样的世界视野为前提；当这样的前提尚未具备之际，所谓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根本不可能前来同我们照面——它还根本没有被构成。

最后，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现实定向在要求其自身被中国化的同时，不能不要求实现其时代化和大众化，这同样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现实定向——来决定的。时代化的任务起源于对现实本身的历史性理解，即社会现实是历史的，是与时消息的，并因而是通过每一时代之独特的历史性本质而被构成的。所以就像黑格尔将哲学称之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一样，马克思把真正的哲学理解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时代化还不会有太多争议，那么它的大众化也许真让不少人惊诧起来：难道真正的学术能够是大众化的吗？他们就像要躲避“现实”的不洁那样来拒斥大众的鄙陋。但我们在里首先要弄清楚这种大众化究竟意味着什么。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之大众化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不仅要求深入地揭示社会现实，而且要求实际地推进并参与到这样的现实之中——其基本方式就是理论面向群众并掌握群众。这固然需要理论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但尤其需要理论上的彻底，即抓住事物的根本。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和大众化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在理论上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使之真正为大众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大众化在总体上意味着：把现实本身理解为以大众为主体的历史进程，把掌握群众理解为理论本身的实践取向，并从而在学术上不断要求和推进理论上的彻底。

以上这些是《新大众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积极启示，而且我认为，它们也是以现实为基础定向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当这样的要义被研究者自觉地加以掌握和践行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必将开辟出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鉴传今